

■她时代观点

“打扫异性寝室” 损伤学生权利与尊严

文 / 杨朝清

“旷课的男生，要到女生寝室做卫生，旷课的女生，要到教室或男生寝室做卫生。”最近在武汉商贸职业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大一辅导员崔博文对旷课学生的另类惩罚，引发热议。

(6月11日《楚天都市报》)

从实施效果来看，旷课的人数明显减少，该辅导员对自己的“另类惩罚”很满意，美其名曰不仅帮助大学生改变了错误，还锻炼了身体。然而，这样的“暴力育人”，损伤了大学生的权利与尊严。

在一个盛行印象管理的时代里，许多大学生都希望给异性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打扫异性寝室”为一种惩戒手段，不仅让一些旷课的大学生上演了“现形记”，也让他们被标签化、污名化，从一个正常的人被贬低为一个“不上进，不爱学习”的人，遭遇形形色色的傲慢与偏见、歧视与社会排斥。

学生寝室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私人空间，通常情况下并不允许异性的进入。尤其是在夏季，女生穿着较少，进入女生寝室打扫卫生的男生不仅给该寝室的女生造成了不便，也会对其他寝室的女生造成干扰。在许多大学里，即使是辅导员都很少进入异性的寝室，“男生打扫女生寝室”，这又是谁给的权利？对于女生而言，精心打扮的“镜中我”有可能被拆穿，她们宁可提前收拾一番，也不

愿意让男生看到“真我”。

“打扫异性寝室”说到底，就是将失范行为公之于众，让旷课学生感受到外部的压力，从而通过提升违规成本的方式来倒逼学生遵循规则。初衷良善、方法僵化，“打扫异性寝室”损伤了学生的“脸面”，用一种生硬、冰冷的手段去鞭策他们、羞辱他人，尽管在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却难免会给学生留下心理阴影与精神伤害。

在传统社会，师生关系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教师具有很高的权威与教育特权；在现代社会，师生关系是双方在权利平等、地位均等的基础上建构清晰的权利与义务的边界的关系，教师也要遵循角色规范与职业伦理。当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辅导员的自弹自唱，难免会陷入孤芳自赏的边缘化境地；“打扫异性寝室”看上去很美好，本质上是一种扭曲的教育审美。

“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学生的权利与尊严也需要呵护。没有了“爱的教育”，没有了仁爱之心，教育就会上演“变形记”。辅导员作为教育从业者，不能过于追求工具理性；鞭笞、羞辱学生的“打扫异性寝室”尽管见效快，却侵犯了学生的正当权益，损伤了师生关系。对旷课进行有效治理，方法有很多；立竿见影的“打扫异性寝室”，理应果断叫停。

■一针见血

猥亵伴娘不是“婚闹” 是“法闹”

文 / 李秀荣

6月8日，一条“伴娘被袭胸猥亵”的视频在网上传播，这条疑似西安某地结婚婚闹的视频显示，在车内，两名男子分坐在身穿伴娘服饰女子的身边，对其袭胸脱衣。其间，伴娘不停阻止并喊叫，甚至咬其中一名男子的手臂，仍未能阻止两名男子的行为。最后，两名男子还将女子的裙子掀开，称要脱掉其内衣。视频引发网友谴责，也引起西安警方关注。6月10日，警方找到当事人并带走调查。

(6月11日《西安晚报》)

经警方初步调查，视频所涉及内容发生于一场婚礼。可是，这哪里是闹婚？分明是猥亵，涉嫌犯罪。所以当地警方表示：《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相信这起“闹婚变猥亵”事件，会得到警方的依法妥善处理。

可以说，类似的“闹婚变猥亵”绝非个案，但被警方关注、调查与处理的，却鲜有听闻。有人可能认为，婚礼是中国人传统的“狂欢节”，闹婚、闹伴娘也是传统习俗，且在婚礼场合，怎么闹都不过分，很多当过伴娘且被骚扰甚至猥亵的女性，也碍于朋友的面子和婚礼的

气氛，只能忍气吞声。

然而，这种没有任何约束力的闹婚习俗，让一些人借着酒精的挥发，有意无意地乐过了度，玩过了火。一场原本神圣喜庆的婚礼，因为有了无礼客人伸出“黑手”搅和，便落得个不欢而散甚至反目成仇。这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状况？因了这种社会状况，很多女性因心生害怕而拒绝当伴娘，色情女由此在各地伴娘市场渐呈走俏之势，堂而皇之地登上婚礼的大雅之堂，这是婚者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很明显，社会的发展不能以文明的丧失作为代价。传统习俗是乡村社会传承下来的，大多存在一些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成分，传统习俗应该跟上现代文明的步伐。在越来越重视个体尊严、关注个体内心感受的现代文明社会，结婚应该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婚礼应该是隆重而圣洁的。虽然禁止性骚扰已写入法律，法律之剑已高悬在骚扰伴娘或新娘者的头上，但借闹洞房之机发生的、群体性的猥亵行为，却仍以冠冕堂皇的“喜庆”理由大行其道，这种状况的确应该彻底改变了，使之不再是一种暴露人性阴暗面的恶俗。

当这种根深蒂固的陋习，并不能靠市民自身素质的提高来移风易俗时，法律手段的适时介入，便是恰当的惩戒和规劝，以让现代文明元素和法治理念不断注入到传统闹婚习俗中去。

■社会观察

“碳减排红包”具有环保宣传导向意义

文 / 江德斌

车主每少开一天车，便可获至少0.5元的奖励。6月11日至17日是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市发改委联合北京环境交易所等单位开展的“我自愿每周再少开一天车”的活动启动。燃油车车主每停开车24小时，便至少可获得碳排放收益0.5元，奖励以微信红包方式兑现，并有电子优惠券等奖励。在空气重污染预警的情况下停驶，奖励还将加倍。

(据6月12日《新京报》)

显然，不可能指望“碳减排红包”发财致富，不过该奖励具有环保宣传导向意义，乃是向车主和公众传递正确的环保理念，鼓励市民减少开车频次，减少人为污染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环保部日前公布的《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2017)》显示，我国连续8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国，2016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95亿辆，机动车尾气污染已成为我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是造成细颗粒物、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有资料显示，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及东部人口密集区，移动源对PM2.5浓度的贡献率高达20%-40%。

可见控制汽车尾气排放量，对于治理空气污染、降低PM2.5浓度有很大作用，而减少市民开车频次，就是一大环保举措。由于现在城市汽车保有量很高，各地城市均面临交通拥堵压力，特别是北上广深等

一线城市，交通拥堵情况最为严重。从交通工具的效率来看，私家车出行效率是比较低的，耗费资源量较大，如果市民能够改变出行方式，不再过度依赖私家车，就能大幅度降低开车频次，从而助力控制尾气排放量，降低对空气污染的有害性。

据专家测算，1.6升至2.5升排量的机动车停驶一天能够减排12.4公斤二氧化碳。每天少开车1公里，一年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1棵15年树龄的杨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由数据可见，停开或少开车，对于保护环境的作用非常大，只是效果没那么快，需要长期坚持住。而且，个人的力量也是很单薄的，减排的贡献值极为有限，但要是参与的人达到一定基数，就会形成改变环境的力量，所谓聚沙成塔，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不要因“碳减排红包”额度太小而看不上，也不要因感觉个人能力有限而不愿意参与，须知在治理空气污染这件事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毕竟空气环境改善了，对社会公众都是好事。“碳减排红包”只是一个小小的激励政策，也是实验性的举措，究竟效果如何，能否唤醒广大车主的环保意识，则需要经过实践才能知晓。不过，环保发展就是如此，在一步步微小、不起眼的推动下，逐步改变人们的意识，树立起绿色环保的社会观念。

车厢可争议，“女性优先”应成共识

文 / 李云

近日，深圳地铁将设立“女性优先”车厢的消息引发热议。有观点认为这样会加剧本已紧张的公共资源，并且是一种变相的性别歧视。对此，提案人广东省政协委员苏忠阳回应，“女性优先”车厢不是强制专用车厢，而是培养女性优先搭乘地铁的文明习惯。

(6月10日《新京报》)

“女性优先”车厢产生争议，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所以，一个新鲜的东西可能在关注中更好地成长。“女性优先”车厢，到底是变相的性别歧视，还是文明习惯的养成载体？或许，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妨先试点一下，用事实说话，拿实践验证，让争议逐步形成共识。如果车厢这种形式有效果，利大于弊，在兴利除弊基础上推广；如果车厢这一形式不理想，弊明显大于利，再想其他办法。

“女性优先”车厢可以争议，“女性优先”应该成为社会共识，尤其是在公共资源紧张的情况之下，这也是公共精神的体现。公共精神是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的主观认可并体现于客观行动上的遵守、执行。公共精神包括独立的人格精

神、社会公德意识、自制自律的行为规范、善待生命社会的慈悲胸怀。“女性优先”要成为一项“她权益”，既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又是公共精神的诠释。

总有一些经典让我们动容——2005年9月23日，重庆杨家坪3男3女被困电梯40多分钟，男士们费力将电梯扳开一丝小缝，让女士轮流挤在缝隙边吸气，自己则规规矩矩蹲在里侧，其中一位民工，众人获救时他缺氧昏倒。有人感叹，“让女士先呼吸”，折射出的绝不是男性风度那么简单，其中蕴涵的人性光辉及共生意义足以超越性别范畴，而上升到社会意义的层面，对社会道德困境下的人们尤其是处在强势位置下的人群更具有启示意义。

“女性优先”需要政策与制度呵护。从法律法规层面上讲，有《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的特别关怀，还有地方通过立法的形式进一步强化“她权益”，量身定制的法治保护，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她”；在社会的一般领域，尝试“女性专用”的社会化服务，是“她权益”的扩容与升级。其实，关心女性就是关心我们的女儿、姐妹、母亲。当“女性优先”逐步成为制度共识、行动共识后，社会将更温暖，社会秩序将更井然。